



〔美〕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 著

革命的良心

——苏联党内反对派

北 京 出 版 社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革 命 的 良 心

——苏联党内反对派

[美]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 著

高德平 译 张斌 校

北 京 出 版 社

Robert V. Daniels
Das Gewissen der Revolution
(Kommunistische Opposition in der Sowjetunion)
Berlin, Verlag Oue & Wolter, 1978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革命的良心

——苏联党内反对派

[美] 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 著

高德平 译 张 斌 校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0.375印张 487,000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400

书号: 3071·361 定价: 3.65元

(内 部 发 行)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是美国弗蒙特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历史学协会斯拉夫和东欧历史研究会主席。

《革命的良心》一书叙述的是十月革命至三十年代初苏联党内斗争的历史。这一段历史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首次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政权体系和经济管理体制的历史，也是所谓苏联模式的形成史。在这段时期里，围绕着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建立政治、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其中若干原则问题至今仍是苏联东欧政治、经济改革中所争论的问题。本书记载了苏共党内历次重大争论的由来、发展过程及其最终结局。该书基本上按时间顺序编写，它除了依据官方公布的材料外，还引用了某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当时的官方出版物及地下刊物，材料来源广泛，所引证的资料均注有出处，便于进一步考证和研究。虽然作者在书中提出的某些观点是错误的，有些观点尚待探讨，但书中援引的大量资料可供有关领导干部，以及国际共运、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人员和史学工作者参考。

目 录

一九七八年德文版序言·····	(1)
导言·····	(7)
第一章 布尔什维克党的形成·····	(15)
一、党的思想·····	(15)
二、左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右的布尔什维主义·····	(22)
三、国际主义与各个党团·····	(48)
第二章 一九一七年大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	(58)
一、不断革命·····	(59)
二、“重新武装党”·····	(66)
三、左派孟什维克的加入·····	(76)
四、革命的纲领·····	(84)
五、起义问题·····	(90)
六、是联合还是专政·····	(103)
第三章 围绕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争论和左 派共产主义者·····	(114)
一、革命战争与和约·····	(115)
二、处于党分裂的边缘·····	(123)
三、工人监督与国家资本主义·····	(131)
四、在列宁主义基础上建立统一·····	(142)
第四章 战时共产主义和关于集权化的争论·····	(148)
一、向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和集中领导问题·····	(149)

二、国际革命和民族问题·····	(153)
三、乌克兰——反对派的堡垒·····	(156)
四、军事反对派·····	(165)
五、工业管理·····	(171)
六、政治权力的集中·····	(175)
七、伟大的党内民主时代·····	(183)
第五章 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	(188)
一、战时共产主义和工会·····	(188)
二、托洛茨基和劳动军事化·····	(190)
三、工会的独立性和工人反对派·····	(197)
四、工会问题的讨论·····	(204)
第六章 一九二一年的危机·····	(216)
一、压制极左派·····	(217)
二、喀琅施塔得的叛乱·····	(226)
三、党的统一的建立·····	(229)
第七章 列宁主义的恢复·····	(241)
一、新经济政策——是策略还是演进?·····	(241)
二、控制工会·····	(244)
三、党内紧张气氛·····	(249)
四、作为政治权力的党的官僚政治·····	(259)
第八章 政权空白期·····	(267)
一、继承人和“三驾马车”·····	(267)
二、民族问题和列宁与斯大林的决裂·····	(273)
三、官僚主义和党的改革·····	(291)
四、运转中的机器·····	(300)
五、经济政策上的分裂·····	(308)
六、围绕继承问题所进行的幕后活动·····	(317)

第九章 围绕新方针的争论	(323)
一、一九二三年夏的危机	(323)
二、外国共产主义问题——德国危机	(328)
三、幕后的争论	(333)
四、公开的分裂	(346)
五、机关的胜利	(354)
第十章 列宁逝世后的党	(362)
一、统一和教条	(362)
二、“十月的教训”和反托洛茨基主义战役	(372)
三、不断革命论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	(381)
第十一章 季诺维也夫反对派	(386)
一、“三驾马车”的分裂	(386)
二、农民和新经济政策	(393)
三、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国际	(400)
四、党和书记处	(408)
五、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崩溃	(412)
第十二章 联合反对派	(418)
一、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形成	(418)
二、斗争过程	(424)
三、关于工业化问题的争论	(443)
四、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还是特米多尔式蜕化？	(448)
五、党内民主和官僚主义	(456)
六、党的统一的心理学	(463)
七、左翼反对派的毁灭	(473)
第十三章 右翼反对派	(489)
一、粮食危机和斯大林的向左转	(490)
二、共产国际和“右倾危险”	(509)

三、莫斯科党组织的危机·····	(514)
四、工会中的右翼反对派·····	(525)
五、经济计划问题·····	(532)
六、哲学上的争论·····	(550)
七、公开的分裂和右派的毁灭·····	(554)
第十四章 “人民的敌人”·····	(565)
一、流放中的左派·····	(566)
二、不幸中的右派·····	(575)
三、清洗运动·····	(589)
四、死者不死·····	(598)
第十五章 反对派为什么会失败·····	(611)
一、反对派政治上的虚弱·····	(611)
二、列宁主义的前提·····	(616)
三、社会演变的吸引力·····	(619)
四、马克思—托洛茨基—斯大林·····	(624)
五、斯大林的俄国·····	(628)
附件 苏联共产党历史年表·····	(631)

一九七八年德文版序言

自本书于五十年代写成以来，共产主义运动（本书就是探索它的早期历史）已发生了时代性的变化。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最严重的弊端进行了批判，这不仅在苏联社会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民族分支（在执政党和非执政党中）都引起了风波。旧的、由莫斯科制定的运动纪律已溶化在多中心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就使各个党有可能根据当地的情况不同程度地偏离苏联的旧路线。一九五六年以来，各个东欧共产党政府已开始在本国试行内部自治，并取得了不同的成果。新的共产党巨人中国不仅在外交领域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走上了它自己的道路，并成为一支能与苏联相抗衡的力量。许多非执政党也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本国的一个政党，并与本国的民族传统建立了联系，这首先反映在欧洲共产主义这一新的现象之中。最后，在苏联本国，自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垮台以来（赫鲁晓夫的垮台使非斯大林化必将导致苏联社会真正自由化的希望破灭了），出现了一场不可抗拒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这场运动至少对加深民主社会主义的认识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这些非常的变化是否使苏联的早期历史，即斯大林主义被确立之前的派别斗争史和社会演变史，变得没有二十年前那么重要了？根本不是。很显然，情况恰恰相反。苏联、它的卫星国和依赖于它的兄弟党以及苏联国内的批评家们之间存在的意见

分歧和差别，使革命后的头十年的苏联反对派运动史变得更加重要了，它有助于认识今日的共产主义运动。

今天，这段历史的意义之所以增强了，其理由是很简单的：因为今日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的分裂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就是对革命后按斯大林主义建立起来的特殊统治制度的一种反动。这种统治制度是在俄国革命之后头十二年内产生的，并在当时激起了反对派的一系列抗议。这个统治制度的特征是：牺牲地方苏维埃的自治，实行共产党的中央集权化和官僚统治化；牺牲工会的独立性和工人监督，在工业中恢复经理统治；压制党内由普通党员到领导层的真正的民主讨论和民主集中过程；把群众的经济和文化的进步要求置于权势利益之下，置于政治和军事利益之下；以极不严肃的态度操纵外国同情者，使之服务于苏联的利益或某个集团的政治利益；压制文化自由和实行严厉而又蛮横的纪律控制，并强迫各流派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接受这种纪律；发展一种单一的教条，操纵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要人们盲目地顺从领导和不容置疑地相信他们所作的辩解。所有这些特点从斯大林牢固确立了其统治地位的一九二九年起直到今天，始终是苏联统治制度的基本特征。尽管赫鲁晓夫在六十年代进行了某些有限的改革，但上述特征甚至可以说更切合今日苏联的实际。在《革命的良心》能首次得以发表的时代，这些特征显得更清楚了。

由于人们对苏联官方模式的不满，近年来，已出现多次以各国共产党独立于莫斯科为目标的，或者代表着不同观点的运动，而所有这些运动都不同程度地触及上述问题中的某几个问题。不仅如此，目前，任何一种偏离莫斯科的运动都能从苏联当年的各种反对派中找到其相类似之处。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运动（从铁托的南斯拉夫直到今日的波兰和匈牙利），即使与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的布哈林右翼反对派不完全一样，两者的哲学却有着

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运动虽然是按纪律严明的统一的党的设想在进行，但它允许在经济方面实行分权制度，注意消费者的愿望，并允许较大程度的文化自由和个人自由。西方的新左派似乎已重新回到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的苏联极左集团的理想上。当时，这个集团的特点是：激烈抗议正在出现的苏维埃官僚制，要求保持平均主义，贯彻干部和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的思想。就其目的和希望来说，一九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为建设一个“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而发起的运动（它要求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结构民主化）可能与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七年间左翼反对派（托洛茨基在这一反对派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所发起的“工人民主运动”最接近于把政治民主化与放宽经济政策等反对派观点都结合在一起的思想，尽管在二十年代只得到很少几个人的拥护（其中有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和达·波·梁赞诺夫——如果说我们把非法的孟什维克排除在外，他们的观点与这种观点是很接近的），但今天，这种观点在国际运动中仍有它的代表，它对欧洲共产主义来说似乎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这里所做的比较并不意味着，今天的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就一定是苏联反对派的这一种或那一种观点的继续。自二十年代以来，人们积累了大量的具有戏剧性的历史经验，因此不可能是简单地抄袭反对派的旧观点而形成当代的纲领。但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持不同政见者对斯大林主义的专政感到不满的，基本上也正是反对派在五十年前甚至六十年前就已认识并徒劳地与之展开了斗争的那些根本问题。在他们探讨的问题中，至少有部分是相同的问题。这首先是，他们不得不对斯大林主义的这一教条提出疑问，按照这一教条，一个领袖或一个小集团可以垄断真理，并有权取缔一切其他具有创造性的思考，不管它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也被迫对党的一元化领导这

一教条提出疑问。这一教条对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九年的反对派分子来说，仍是不可逾越的崇拜偶像，即使当他们对列宁主义的全部内容进行了猛烈抨击时，他们也没有公开怀疑列宁主义的这一基本先决条件。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人们显然拒绝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思想；在一九六八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们实际上也是持这种态度；但是，这两种发展最终都遭到了苏联军队的镇压。明确主张民主的欧洲共产主义者们要想赢得人们的信赖，只有公开审核这一致命的党的一元化思想，这是二十年代的反对派所没有做的。但是，就这一点而言，在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就不存在什么大的区别了——同二十年代一样，持不同政见者迟迟不承认这一点。

《革命的心》的中心思想是，二十年代的反对派是在这样一些条件下企图贯彻其观点的，例如：国家的落后和人们对各种强制办法的偏爱等主要条件（这些都是革命和内战的遗产）。这些条件使反对派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注定很难成功。相反，这些条件却为贪权的个人野心家获得统治开辟了道路，他们为了获得政治上的成功不惜歪曲革命的理想，甚至把它歪曲到面目全非的地步，从而使这种革命理想已失去任何有效价值。因此，许多西方革命者认为，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打开西欧共产党人的眼界时，他们已开始逐步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当时不得不——也许今天还始终必须——通过认识苏维埃俄国的历史及其起源来开辟一条道路，以便重新揭示革命者的真正理想以及这一理想所遭受的悲惨命运。但这里有一个区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在那种曾使苏联反对派的希望与打算落空的、十分落后的、突然爆发革命的环境中进行活动的。由于这个原因，今日的反对派思想要比它开始形成的那个时期更有效、更适用。而且还因为苏联今天已不再是一个落后的、遭到破坏的国家，所以这种情况在它本国也

是如此。

尽管（或正是因为）反对派的历史对认识当前苏联制度的性质、问题和弱点至关重要，苏联官方对反对派的历史所持的态度自赫鲁晓夫以来几乎完全没有变化。只有很少几个没有经过审判而被处决的反对派分子被恢复了名誉（例如阿·谢·布勃诺夫和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但人们闭口不谈他们是属于哪个反对派的。苏联历史学家的著作披露了大量记载于档案中的详情，但这仅是出于支持正统路线这一目的，即说明反对派完全错了，说明反对派即使不是撒旦的子孙，也是最反动的。至今还没有一个反对派的重要领袖和公开审判的牺牲者被恢复名誉或者以较宽容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尽管他们活着的亲人慷慨激昂地呼吁要求平反，如托洛茨基的遗孀对托洛茨基的案件和布哈林的遗孀及其儿子对布哈林的案件都发出过重新审查的呼吁。）

尽管在历史问题上坚定不移地坚持斯大林的观点，这将在国内外明显地有损于苏联的身份和信誉，但苏联领导仍旧不准备对它的真实起源进行一次审核。从苏联当局压制反对派的真实思想和贬低其领袖的功绩这一点中可以看出，苏联制度患有一种只能被看作是严重的历史神经官能症的毛病，它类似一个精神受到严重干扰的人，由于忧虑、冲突和令人遗憾的事件与他有关，从而压制或歪曲对其过去的回忆。这种官方神经官能症的难以治愈就是苏联领导仍然保持着斯大林主义特性（如果说不是唯一的，但也是基本的特性）的见证。然而，人们迟早会突破被掩盖的历史所固有的压力。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就像我在一九六〇年所设想的那样，它将成为苏联官方风气发生真正变化的重要标志，从而也是苏联政治制度作为一个整体发生真正变化的重要标志。我这次不对本书的细节和结论作进一步的加工和修改，尽管苏联历史学家从文献中援引的资料可以使某些历史情节变得更清楚，但

近二十年来情况的进一步明朗化并没有因此而产生改变本书的中心思想或某些结论的必要。^①这一中心思想和某些结论在此期间甚至被证实是正确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我的新读者们也能得出这样的看法。

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

^①本书援引的许多材料可以从后来由乌尔弗·沃尔特主编、奥勒—沃尔特出版社出版的文选：《一九二三—一九二八年苏联左翼反对派》中找到它的原始资料，因此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可以从中详细地了解这段时期的争论情况。此外，在此期间还出版了一本论文集：《社会主义辩论》，它是上述文选的一个讨论文集，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讨论了各项争论问题。

导 言

一九一七年，一批革命者在俄国取得了政权，并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他们所喜爱的称呼）。按照传说，这个布尔什维克组织^①是一个有明确目标的、经受过锻炼的和有纪律的集团，它忠实地执行其领袖列宁的意志。自一九一七年起，共产主义革命的追随者和反对派都断言，随后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合乎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一九五六年，苏联共产党最核心的阶层突然承认：革命已陷入死胡同近二十年之久，一个固执的、掌握着大权的人控制了革命的社会并违反了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切准则。

正像俄国之外的受到震惊的共产党人在努力对这种实际情况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时所承认的那样，斯大林的专政不只是由于出现了一个恶人所致，它的根源很深，一直延伸到布尔什维主义追随者们的身上。但是，对苏联的极权主义绝不可简单地加以解释，仅就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加以论述也是不够的。在斯大林按其个人设想塑造共产主义运动之前，共产主义运动就不是

^①在一九一八年三月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这个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在此以前，它名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一九二四年，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之后，它又改名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一九五二年，这个名称再次改动，现在就叫苏联共产党。按照共产党人自己的说法，本书把“布尔什维主义”和“共产主义”当作同义词来使用。一九一八年以后，这两个措词的含义有了一点细微的差别，“布尔什维主义”是指不很具体的运动思想，“共产主义”是指组织结构。

单一的、清一色的和铁板一块的，而是错综复杂的、分裂的和不断变化的。苏联共产主义的历史（简单说来）可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克服了意见不统一；但在第二个阶段中，不得不承担其后果。

就像共产主义反对派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在第一个阶段或极权主义之前的阶段（直至一九二九年），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存在着根本的意见分歧和冲突。在这些年中，运动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因此，今天的共产主义可以被看作是这种情况演变的产物。

因而，从一开始就弄清楚苏联共产主义的这种由发展过程和各種情况所决定的、事先没有预料到的特性，是十分重要的，否则，人们就会严重误解党内派别斗争的历史，并忽视这场斗争对苏联制度的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性。本作者认为，对苏联制度和苏维埃政治表现的误解大都产生于一种对共产主义的静止观点，即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思想，这种思想（不管是好是坏）乃是列宁和马克思思想出来的，并被一批坚定的年轻人运用于实践。实际上，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和首批追随者中大部分人已或迟或早地发现，运动使他们的希望落空了；然后，他们不是与它断绝了关系就是本身被统治者清除了。

尽管官方后来所写的历史硬把党说成是无所不知的，但总的说来，导致俄国共产党人分裂和争论的那些路线变化并不是事先早有计划的。政策之所以变动，是因为人们要解决一些未曾预料到的新问题，或者是因为一批具有不同价值尺度的新人物上升到了有影响的地位。苏联政治发展的方向就是许多因素的综合产物，这些因素是：历史环境，社会和经济状况，理想和思想，相互争斗的领导人物的习性、意向和爱好。直接影响历史发展的人往往是根据当时的现实形势行动的，不大可能意识到他们的行动

将会产生什么后果；而他们的意志和行动又仅仅是汇集在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中的诸因素之一。弗·恩格斯在一八八五年写道：

“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总是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象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①

在共产党内部的派别斗争史上，曾多次出现过相同类型的政治态度，可以用提纲式的论点对它们加以描绘和区分。当然，这样做有可能冒过分简单化的危险。本作者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就其在革命时期的状况来说，基本上包含了两种始终不渝的、具有不同观点的思想流派。如果允许的话，人们将宁愿用它们各自常用的说法来称呼这两个对立的流派，即“列宁主义”派和“左”派。就其本质而言，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区别就是政权和原则、革命的实用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之间的区别。虽然它们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是始终那么分明、单一，但不能不承认，它们强调的重点各不相同：一派注重革命的目的，另一派首先想的是取得成功所必需的手段。

以纲领和理想为一方与以政权工具和实际必要的强制办法为另一方之间的对立紧张关系就是苏联早期历史中的一个核心问题。由于共产主义列宁派战胜了左派、现实战胜了纲领，这种紧张关系也就消失了。那些比较忠于原来的革命目标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权力，而他们追求的目标也被证实是一种幻想（至少在俄国的状况下是如此）。代表现实和能适应各种情况的人占据了政权中的领导位置，这种人的典型代表是斯大林。共产党专政这一为实现目的而采用的手段却成了本身的目的，而且变成经久不变的目的。

^①弗·恩格斯：《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302页。